

17~19世纪广东与越南地区的文学交流

夏露*

序 言

17世纪初,郑阮南北对峙局面结束前后,日本、暹罗、荷兰以及中国的商船进入越南主要港口,开始了国际间的贸易。在越南一些较大的城市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有了发展条件。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封建制度、寻求个性自由的新思想在市民阶层中普遍发展起来;在文学领域中也开辟了反封建作品的新生园地。而随着西山起义(1773年)的成功,不登大雅之堂的喃文一度被列为与汉文并驾齐驱的官方文字。由于喃文与越南语口语适应,许多反映越南民间文化特色的作品开始创作并流行,以胡春香为代表的诗人甚至大胆地以性隐喻为武器抒写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作品,即使是居高位的士大夫作家们也在使用汉文创作的同时兼攻喃诗文,创造了汉喃文学双峰并峙、两水分流的黄金时代,《征妇吟曲》、《宫怨吟曲》、《花笺传》、《金云翘传》等喃文长篇巨作以及《皇黎一通志》等汉文长篇小说纷纷诞生,成为越南古典文学史的一座座丰碑。

越南文学史的发展自然受其本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制约,但外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的重大影响也是越南学者和文人普遍承认的事实。中越文学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如越南学者邓台梅就认为越南的古代文学“从文字到典故,从文学体裁直到儒家的世界观都从中国文学中和盘端来”^①。在越南,学者们认为其近千年的古代文学发展进程始终表现为两个

*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南亚系越南语教研室副教授。

① 邓台梅:《邓台梅文集》,(河内)教育出版社,2002,第157页。

过程：其一是向心过程，即心向当时汉文化圈的核心国——中国，以便成长、壮大。在这一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汉文作品常常被先前的人用来与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进行比较，对他们的特色性赞誉莫过于“与中国并驾齐驱”。^①但同时，越南文学也始终表现为第二个过程，与前面相反，这是一种离心过程，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力图摆脱中国影响而形成本民族文学特点的过程。这个离心过程在一切文学创作的领域都表现得十分强烈，深刻体现了越南人精神生活的特异性以及他们的艺术创造与思维潜能。从体裁来看，我们看到向心过程在10~15世纪表现得较为强烈，此后变弱；而离心过程在16~19世纪表现强烈，之前较弱。它们就像两个反作用力推动着文学的发展。这些所谓向心和离心的观点常常见诸越南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但考察越南文学的实际内容，可以发现，在所谓16~19世纪强烈的离心过程中，越南文学实际上依然与中国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戏曲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例如上文所列举的每一部作品其实都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肉联系。

不过，谈到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学界多注意到国家层面的文学交往，尤其将之归功于越南长期采用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以及中越宗藩关系所带来的上层使者即两国使臣的诗赋外交活动，而罕见有人研究南方地缘关系及跨境民族所带来的文学交流与影响。实际上，比起上层之间的影响，地缘关系的影响或许更为深广。中越山水相连，有广阔的海陆边界，两国的文化也因此得以相互渗透。颜保先生在《浅说中国文化与越南》一文中曾形象地说：“越南有两条大河——其一是在地图上找到的，那就是北方的红河和南方的湄公河（亦称九龙江）。它们发源于中国云南省和青藏高原。千万年来，他们不断地带去中国的泥沙，灌溉着越南耕地，养活着越南的人民。而另一条则是发源于中国的文化大河，数千年来，给越南人民输送了大量的精神养料，丰富了越南的文化宝库。”^②这种看法自然是不错的。不过，在中越山水相连的问题上，除了这两条有源头的大河，还有一块不容被忽视的海域，这就是北部湾。这片位于中越之间的半封闭的大海湾，它的东边是

① 例如，黎贵惇在其《见闻小录·篇章》中评论越南诗文就不断使用类似用语，如：“本国李陈二代，正当上国宋元间，风气淳和、人才英伟，文章气格不异中州……李时之文，骈偶绚丽，尚类唐体，迨陈时则整畅条达，已似宋人口气矣。”再如“《摘艳诗集》，选陈朝、前黎先辈诗文，秀杰超迈，杂北国诗中，当不可辩；观序引诸姓氏，可想当时文运之昌、著者之富”。按“上国”、“中州”、“北国”在越南古代文献中都指中国。

② 颜保：《浅说汉文化在越南》，卢蔚秋编《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149页。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边是越南，南边与南海相连。环北部湾的粤桂地区与越南在地理、历史、种族、文化等方面都有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早在秦汉时期北部湾诸民族曾长期隶属于相同地方政权的管辖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设置的象郡就包括北部湾的越南北部、广西及广东的一部分，这或许是最早将这一地区置于同一行政区域管理的事例。之后，赵佗建立南越国更是加深了此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据说赵佗统治南越之初，人们从广东到北越之间一路上的言语交流需要经过许多民族的多重翻译，赵佗便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① 汉字在先秦就已经传入岭南，但是岭南人广泛使用汉字则是从南越国开始的。也可以说自此开始，两广与越南一同面临着对北方儒家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东吴以后交、广分治，但作为南中国新兴的经济区，两地是互利互动、共同发展的。隋唐帝国“郡县其地”，岭南道再次把交广地区统辖在一个相同的行政、军事区域之内，广州和交州是岭南经济区两大中心和南海贸易枢纽。南汉以后安南逐渐走向独立，并与宋元两朝确立藩属关系，越南朝贡，例由两广水陆通道来华。明清时期中越两国长期维持以朝贡贸易为中心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邦交、外贸关系，两广是沟通中越的主要孔道。两国民间交往相当密切，贸易、移民、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对两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环境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共时层面上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各个民族之间，其文学上出现水乳交融的关系也是自然的。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提出种族、环境与时代是艺术的三种基本动因。在丹纳看来，种族是艺术的“内部主源”，环境则是艺术的“外部压力”，而“时代”则是“内部主源”在“外部压力”下发生作用的“倾向”。^② 就“环境”而言，北部湾周边地区不仅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条件相似，而且有着共同的区域人文因素，这种区域文化犹如精神气候对这一地区的文学产生了影响。如果更多地关注到人文环境形成的关键一环——经济因素，触及与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话，那么，以存在决定意识来看，这一地区的文学就不可能没有碰撞、交流与融汇。笔者今以广东为起点，试图从人员流动与书籍传播的角度来探讨越南文学与中国南方文学的紧密关系。

① 张秀民：《从历史上看中越关系》，《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1~10页。

② 参见丹纳《艺术哲学》第二章相关阐述，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一 人员流动所形成的粤越两地诗文交往活动

广东文学与越南地区人员往来带来的文学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有迹象表明越南地区的一些民间传说甚至文人创作作品与广东地区的许多民间传说惊人相似，例如越南早期的喃诗传《林泉奇遇》^①是根据中国唐代佚名《孙恪》^②改编而成。《孙恪》又名《补江总白猿传》，是唐传奇的名作，也是著名的广东地区传说。据《岭海青华记》云：“峡山，在清远城东三十里，一名中宿峡。两峰矗立，中贯江流。……上有飞来寺。宋崔与之留题云：万里星槎上旋，名山今喜得攀缘。猿挥孙恪千年梦，日照维摩半夜禅。磴长荒苔人迹少，崖攒古树鹊巢悬。江流上溯曹溪水，时送钟声到洞前。……又有归猿洞，即唐孙恪同妻袁氏至寺献玉环处。黄莘田《归猿洞》诗云：归猿洞口月微明，碧玉连环有旧情。行客听来肠欲断，

① 喃传即越南人用喃文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歌。18世纪以前多用七言八句诗歌，以后则多用六八体诗歌形式。越南六八体诗歌是文人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结合唐律创造而成，多用于喃文创作，极少见汉文六八体诗歌。讲平仄和押韵。越语有六个声调，越语的平声是指横声和玄声；仄声是指锐声、问声、跌声和重声。六八体通常是用平声韵，但有时也有仄声韵，称为变体。顾名思义，六八体由六八字句相间组成，句式韵律如下：

平平仄仄平平（起韵一）

平平仄仄平平（腰韵一）仄平（另起韵二）

平平仄仄平平（腰韵二）

平平仄仄平平（腰韵二）仄平（另起韵）

中国律诗的平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越南也基本如此，不过，比中国诗歌自由得多，但最后一个字和第四字必须遵循平仄。由于中间可以换韵，加上越南语的元音丰富，所以六八体易于用来写长篇故事。双七六八体与六八体基本相同，但在每六八句前加两个七字句。其格式为：

平仄仄平平仄仄（起韵一）

平平平仄仄（腰韵一）平平（另起韵二）

平平仄仄平平（腰韵二）

平平仄仄平平（腰韵二）仄平（另起韵）

还有一种六八间体，是六八在前，双七在后，以六八为主体，偶尔夹杂双七句。这种比较少见，不再赘述。《林泉奇遇》又名《白猿孙恪传》，是由146首七言八句诗歌组成，具体内容如下：广寒仙女被谪人间，变为猿猴，到飞来寺拜玄奘为师。满期已满，白猿留恋尘世，幻作美女，与书生孙恪为婚。孙恪有一位老友，得知孙与白猿缔结婚姻之经过，赠送孙一把除妖宝剑，嘱孙挂在房中，白猿果然不敢入室，离孙返回天宫。后孙中状元，仙女恋红尘，重返人世，与孙团圆。

②（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45，中华书局，1961，第3638~3641页。此传奇在《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书中著录为《补江总白猿传》。

三生啼彻第三声。名山胜境，为道书十九福地。”^①可能是越南人或广东人将这一故事带到了越南，也可能这是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共同母题的传说。

17世纪中叶，大量广东人因明清鼎革造成的社会动荡移居东南亚，越南是他们南渡海外求生的第一站。前往越南的广东人甚至成百上千地大规模迁移。越南至今对中国有一个带贬义色彩的简称——ngu'ò'i tầu（船民），大概就始于17世纪起对闽粤华侨的称呼。tầu 喃文写作“艘”，原意为“船”，后来嵌入海陆空交通工具的词汇里，如 tầu hoả（火车，简称 tầu）、tầu điện ngầm（地铁）、tầu bay（飞机）等等。此后，随着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发展，更多的广东人抵达越南中部和南部进行经济文化活动。与此同时，越南地区各界人士也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广州活动。对于这些交往活动，近年来学界相当多地从经济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或许由于材料所限，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的文学交流。

笔者检索相关典籍，初步获得一些材料，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分类阐述这些人员在两地的赠答酬唱、请序题词、鉴赏评点、书信笔谈等直接的文学交往活动。

（一）赴越南弘扬佛法的僧人在当地的文学活动

17世纪中期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禅林危机重重，大量禅师赴越南弘扬佛法；与此同时，越南亦有不少高僧北上中国求法，两国间的僧人互往对越南禅宗的复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段中越佛教交流史中，广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东不仅是僧人南海求法和赴越传法的主要通道，而且也是汉文佛经向越南传播的输送之地。例如元韶禅师（1648~1728），广东潮州程乡县人，系临济宗第33代传承人。1677年他搭乘商船到越南中部归宁府（今平定省归仁），1683年在那里创建十塔弥陀寺。不久，赴顺化创建国恩寺及普同塔，1687~1691年曾奉阮主阮福湊之命回广东延请石濂大汕和尚及佛像、法器。1696年左右，元韶应阮主之命去住持河中寺，直至1728年圆寂，其门徒在国恩寺为其造塔。元韶主要在越南

^① 转引自徐亮等编注《黄轶球著译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37页。按，崔与之，字正子，增城人；宋嘉熙中，以观文殿大学士奉祠，著有《菊坡集》。黄莘田，福建人，有诗名，道光年间仕于粤，著有《秋江集》。

中部传播中国临济禅宗，形成元韶禅派，从17、18世纪起，已传承12代，至今仍在传承，对越南禅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除元韶外，还有觉灵、觉峰、明宏、兴莲等其他广东僧人到越南传法。与此同时，越南北上广东求法的僧人也不少，例如性泉和尚曾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广东鼎湖山庆云寺习禅，回国时，从中国带回经、律、论等典籍三百部共一千余卷，置于干安寺（在今河内市）。^②而僧人福田曾翻刻过反映岭南禅宗肇庆鼎湖山系的重要典籍《鼎湖山志》。可见广东与越南的佛教因缘之深。

中越两国古代文献向来都是文史不分，因此，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讲，僧人们研习的佛教经典都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而这些南来北往的僧人还有不少直接进行诗文赠答酬唱活动甚至创作鸿篇巨制的。这其中以大汕和尚及其《海外纪事》最为著名。大汕虽不是广东人，但曾长期在广东活动，他去越南也是从广东出发的。大汕原姓徐，名石濂，法号大汕。大汕颇有文采，他与当时广东著名的诗社——白社以及广东著名文人屈大均等均有深度交往。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他应越南顺化政权阮福暹之请，渡海前往越南，在顺化、会安一带居留一年半。《海外纪事》便是他赴越经过及其在越南的见闻实录。对于大汕在越南的事迹，越南典籍《大南列传前编》卷六《石濂传》一文颇多褒奖。《海外纪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大汕“把从广州到顺化间的航程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述。这些都是我国航海史的重要资料”^③。同时它也是文学作品，其中包含有大汕自己创作的《清平调》、《虎门望海》、《渡洋歌》、《初抵大越国诗》、《禅林即事》、《操象行》、《怀陈广州》、《秋夜渡海晓抵会安》、《客中遣兴诗》、《与大越国右丞相宋公书》等近百篇诗文。据《海外纪事》记载，大汕在顺化、会安都见到许多粤商。书中多处记载他与越南当地及旅居越南的闽粤华侨的诗文交往活动。如：“一日，有大学士记录豪德厚命其子持七律诗一首，并所璧银币来见。虽未可以言风雅，然知声韵理解，为此邦威凤灵著者。子亦彬彬秀逸。夜来与国师闲论此中方人名士，有文采风流可邀为白社唱酬者否。国师首举其人……”^④

书中还记录了大汕对越南人所写诗歌的评点与唱和：

① 谭志词：《清初广东籍侨僧元韶禅师之移居越南及相关物问题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如山：《继灯录》卷左，第46页。如山，洪福寺沙门。

③ 大汕：《海外纪事》，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2000，第8页。

④ 大汕：《海外纪事》，余思黎点校，第24页。

诗写性情，句体工拙，可以弗论；但摩诃月对般若风，不无斟酌。遂次来韵，并报书论其诗中数语：

某到贵国，既不往谒，非故倨也，道人不欲以世套待诸公；若泥首阶前，媚于高明，则令旁观笑倒矣。所以韬光答白居易诗云：“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正是方外人不因先趋为贵耳！衲虽道德荒凉，岂不以居易待君子乎！……捧读一遍。信口流出字句，绝无诗人烟霞丘壑，而烟霞丘壑之意，存于言外。杜工部所谓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大雅见惠，不啻十斛明珠，喜出望外，厚仪断不敢滥叨也。一面读诗，一面复札，正思无诗酬谢。及细吟哦佳句中，用摩诃月对般若风，似良璧带疵，惜未全美。冒忝道义知爱，直敢以摩诃菩提儿子。盖般若风，乃子瞻作赠佛印；菩提月，系居易作赠鸟窠，老身不堪齐驱窠、印，明公足以与白苏并驾矣。鄙意如斯，未来识有当万一否？奉和原韵，录呈教我，幸甚。^①

大汕在越南不仅与当地越南人及华侨有诗歌唱和活动，还通过广东客商，与广东文人书信往来，诗赋相送，如“客有惠州来者，述紫诠王使君刻下擢巡川南。奈余羁海外，缺为面送。白社知己，远隔天涯，赋诗以寄云”^②。

大汕写成《海外纪事》后曾请阮王阮福週作序，其序言中有：

虽然，大千世界，尘沙刹土，尽从香水海里结成，寡人方与老和上同游戏于华严香水海中，何处分内外？今既相隔大洋，以广东而记大越行事，即谓之《海外纪事》也宜。^③

可见大汕在越南的活动，虽以传扬佛法为名，但日常的交往多带有文学活动的印记，尤其是书中还记录他曾经多次组织广东戏班到顺化演出，促进了粤越两地的戏剧文学交流。

（二）来广东处理公务的越南文士的相关文学活动

由于中越历史上曾经有近千年的宗藩关系，两国使臣往来十分频繁，这

① 大汕：《海外纪事》，余思黎点校，第24-25页。

② 大汕：《海外纪事》，余思黎点校，第25页。

③ 大汕：《海外纪事》，余思黎点校，本师《海外纪事》序，第17页。

些外交使臣也是中越文学交流的重要使者。尤其是越南赴中国的使臣，多为本国一流人才。他们赴中国途中一路遣兴抒怀，留下了不少燕行文。^① 他们中有一些是从广西经友谊关陆路到达中国政治心脏地区，有一些则从海路经广东再继续北上。例如 1802 年郑怀德出使中国，就是经广东至热河的。郑怀德是越南南方著名的政治家，才华横溢，善于诗文，在史学、文学方面有显著影响，有《北使诗集》、《嘉定城通志》、《华程录》和《艮斋诗集》等诗文集传世。在这些文集中，《艮斋诗集》就是在出使中国途中所作，其中《使行次广东抒怀》等几首诗即写于广东。

19 世纪以后，北部湾周边地区海洋交往日益频繁。因互相参观海军演习或处理中越海难事件，一些越南文士来到广东，公务之余甚至公务途中都进行了相关文学活动，其中以李文馥（1785～1849）最为突出。李文馥不仅是 19 世纪越南接触新世界的著名外交家，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有大量诗文传世。根据《大南实录·李文馥传》记载：

李文馥，字邻芝，河内永顺人，嘉隆十八年领乡荐，明命初授翰林编修，充史馆，累迁礼部金事，协理广义镇务，兼管六坚奇，转直隶广南营参协，办事多中窾，上嘉之，入为户部右侍郎，署右参知。坐事削职，从派员之小西洋效力，又之新嘉波。寻开，复内务府司务，管定洋船如吕宋、广东公干。又擢兵部主事，复如新嘉波，又累如广东、澳门公干。历迁工部郎中，除工部右侍郎，兼奋鹏船如新嘉波。公回，署工部右参知，权理京畿水师事务。绍治元年，特授礼部右参知，充如燕正使。既而以外舶来沱汛，办事不善，案拟发兵。寻开，复侍读。嗣德元年，迁郎中，办理礼部事务。明年，擢光禄寺卿。寻卒，追授礼部右侍郎。

由此可见，他曾经出使北京、广东、福建、新加坡、吕宋等众多地区或国家，难能可贵的是他每到一处都将其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以诗文形式加以记载，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例如他曾连续四年到广东公干，次次都

^① 位于河内的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有不少越南历代使臣赴中国时所作的诗文集，2010 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该校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的 25 卷影印本《越南汉文燕行文集成》（葛兆光、郑克孟主编）。

有文献记载其行。具体是：明命十四年（1833）他与汝伯士、黄健斋等护送广东水师梁国栋失风战船回广东，留有《粤行吟草》和《澳门志行诗抄》；明命十五年（1834）护送广东水师外委陈子龙回国，留有《粤行续吟草》；明命十六年（1835）捕获解送抢掠广南洋分的三名水手回广东，留有《三之粤行集草》；明命十七年（1836）到广东寻找越南失踪水师船只，留有《镜海续吟》。而李文馥这几次出使中国的经过，除了其本人的记载，还见载于中国《清实录》、《清会典事例》、《厦门志》等史籍及《海南杂著》、《桐阴清话》、《雨韭庵笔记》等文学典籍之中。

在李文馥本人有关广东之行的记载中，多次提到他与中国文人的诗文酬唱活动，例如在他《镜海续吟》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明命丙申秋，余偕同官奉命官驾平洋号船之粤，察访公派遣风船艘声息，因于此泊焉。夫澳之游，余向因公历览，与粤友梁毅庵唱酬，志行有集矣。前辈云：江山见惯新诗少。余晚年腹果陈且不多矣也，新云乎哉！间有随口吟咏，积若干首，命曰《镜海续吟》，聊以志其崖略焉耳！^①

镜海是澳门的别称，李氏这部诗集中，有一些是在澳门所作，有些则是在广州的作品。诗作中有一些记录了与粤地人士的友情，如“秋叶飞霜客思驰，春风半面为谁思”及“知君别历到如今，才一相逢感恩深”等诗句。^②

中国文学典籍对李文馥与广东文坛的交流也有相关记载。如清人倪鸿《桐阴清话》卷六载：“道光癸巳，越南国王差官阮焕平（文章）、李邻芝（文馥）、黄健斋（炯）、黎受益（文谦）、汝元立（伯仕）等。护送失风兵船回粤东钱塘，钱塘缪莲仙茂良因招五人集珠江，作中外群英会。即席连吟，极欢而散。黄有句云：‘也知文士以文会，不意此生来此州。’中外唱酬，诚一时佳话也。”^③ 武林人缪良曾经给李文馥的《粤行续吟草》作序，其中也描述了这一次群英会的情景：“癸巳秋，越南国使李君邻芝，偕同官

① 李文馥：《镜海续吟·叙》，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编号 A. 303。

② 李文馥：《镜海续吟·诣澳门分府马士龙》；《镜海续吟·赠香山县丞金天泽》，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编号 A. 303。

③ 倪鸿：《桐阴清话》卷 6。

护送师船来粤。友人刘君墨池邀余，与邻芝诸君作中外群英会。觞咏之余，因得往唱和，阅数月而别。”^① 缪艮还曾编辑《中外群英会录》一书，收录中国文人与李文馥、汝伯仕、阮文章、黄炯等越南文人的唱和诗。此外，广东举人冯尧卿也曾为李文馥的《粤行续吟草》作序。这些文学方面的交流，其意义显然不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还是我们研究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三）粤越两地诗人的互动交往

粤越地区文士之间除了以上因传习佛法、处理政务或旅居中偶然性的文学活动外，也有类似今天国际诗歌研讨会的诗歌唱酬活动，这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广东的白社与越南南方河仙地区的招英阁之间进行的诗歌唱酬活动。18世纪中期南圻河仙文坛领袖郑天赐（1700~1780）组织了清人朱璞、陈自香等二十五人以及越南的郑连山、郑朝旦等六人以河仙镇（今属越南建江省）十景为题进行诗歌唱酬活动，留下了名垂千古的诗集《河仙十咏》。

《河仙十咏》又名《安南河仙十咏》，其三百二十篇诗汪洋恣肆，名噪一时，可谓与当时越南北方汉文学遥相呼应的一枝南国奇葩，亦是研究河仙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越南史书中关于《河仙十咏》的记载不少，《大南列传前编》卷六郑天赐本传云：“（郑天赐）招徕四方学士，开招英阁。日与讲论唱和，有《安南河仙十咏》问世。风流才韵，一方称重。”《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三十七记录了明命十九年（1838）十一月命访求本国遗文，嘱大力搜求家藏诗咏铭记词赋之作。后在文明殿命侍臣张登桂、黎文德读阮居贞《河仙十咏》。明命帝对阮居贞《金屿拦涛》一诗十分赞赏，称“味其言意，阮居贞信有桂石之器负”。又曰“河仙诸咏，联于几暇，每欲依韵续吟，读此数句见得累致天然，笔力遒劲，更不复作。盖天地间江山只有如此光景，诗人品题只应如此说话，前作都已占得是了，后虽有作，岂复有加于此哉！”大有李白在黄鹤楼前叹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慨。之后“又勒礼部传谕河仙，详访郑天赐所作文章，十咏之外，如有别集，即宜搜录以进”。

此外，在越南的一些笔记、地方志和家谱中，关于《河仙十咏》的记载也不少。例如郑怀德在其《嘉定城通志》中谈到河仙时曾说：“（郑天赐）

^① 缪艮：《粤行续吟草序》，见李文馥《粤行续吟草附杂录》，越南汉喃研究院藏，A.1543号抄本。

开招英阁，购书籍，日与诸儒讲论，有《咏河仙十景》，酬和者甚众，其文风始于海陬矣！”书中还具体列举了郑天赐“招英阁”招致的文人学士名录：“招致文学之士，于是福建文人朱谨、陈鸣夏、周景阳、吴之翰、李仁长、陈维德、陈跃渊、陈自南、徐铉、林准则、谢璋、王得路、徐叶斐、徐登基；广东人林其然，孙天瑞、梁华峰、孙文珍、路逢吉、汤玉崇、徐锡纯、陈瑞凤、卢照莹、陈涉泗、王昶、黄奇珍、陈伯发；肇庆府潘大广、阮仪、陈顽、邓明本；嘉定府郑连山、黎伯评；归仁府释氏黄龙和尚、福建道士苏寅先生接迹而至。”越南大儒黎贵惇在其《抚边杂录》卷五中，也曾录郑天赐《河仙十咏》的序文全文和两首诗歌及其文臣的四首和韵。郑天赐的两首诗即《河仙十咏》第九首《鹿峙村居》和第十首《鲈溪渔泊》。又，武世营《河仙镇叶镇郑氏家谱》一书亦对《河仙十咏》及其文化价值有高度评价。

由于作者大多为华人，因此，严格地讲，《河仙十咏》不能完全算作纯粹的越南文学，而是中越文学交流的产物。而有关《河仙十咏》具体诞生的情况，郑天赐在《河仙十咏自序》中有明确说明，其序言全文如下：

安南河仙镇古属荒陬，自先君开创以来三十余年，而民始获安居，稍知栽植。乙卯夏，先君捐馆，予纘承先绪，政治之暇，日与文人谈史咏诗。丙辰春，粤东陈子淮航海至此，予待为上宾，每花辰月夕，吟咏不辍，因将河仙十景相属和。陈子树帜骚坛，首倡风雅，及其返棹珠江，分题白社，承诸公不弃，如题咏就，汇成一册，遥寄于予。是知山川得先君风化之行，增其壮丽，得复诸君各公品题，益滋其灵秀。此诗不独为海国生色，亦可作河仙志乘云尔。

关于白社，笔者查阅有关广东文学史著作鲜有记载，倒是从大汕的《海外纪事》看到相关记载。大汕在书中说他临出发前，曾“告行于当路缙绅、白社知己。随即开春，赆者、践者、馈盘供餐物者、序而送者、歌诗赠行者，从朝至暮”^①。可见，这个文学社团在当时的广东也是颇具规模和影响的。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也不清楚当时文人雅士应邀在招英阁共同唱和

^① 大汕：《海外纪事》卷1，余思黎点校，第1页。

《河仙十咏》的具体情况,而且此诗集全文已经散佚。笔者有幸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河仙十咏》的上册部分,读到其中160首诗歌。笔者发现在诗歌中还夹杂有郑天赐在《河仙十咏自序》中提到的“粤东陈子淮”及另一广东文人余锡纯为《河仙十咏》所写的简短跋文。其中陈子淮跋文中有如下文字阐述他应邀唱和的情景:“士翁先生抱舟楫之才,负湖海之气,丙辰春,余乘错槎抵日南,口柜半载,吟咏终宵,因出河仙十题,相为唱和,细玩大作,有如峻岭彤云,澄江新月,具此才情,何难拍襄阳之肩,而揽嘉州之袂哉!”而署名“岭南老人余锡纯”的跋文中有如下赞辞:“若□古风浑穆,如考周宣之文,丽藻辉煌,俨如陈思之室宁止。金城咏柳,叹壮岁之已非;宋玉赏荷,恨秣花之易谢者哉。”

诗歌唱和作为文人交往的一种形式,在中国源远流长。据记载,曹魏时邺下文人在一起饮酒赋诗^①,西晋时石崇曾组织金谷园诗会^②。而有关写同题诗的诗会也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召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聚会会稽兰亭,写下了以《兰亭》为题的诗歌37首。同题吟咏一地的诸多风景在中国也是常见的,例如,宋代有题写潇湘八景的,相传最早为宋沈括《梦溪笔谈·书画》中所描述,后历代皆有才子追和。至若文人结社论诗,则为明清时期十分普遍的风气。郑天赐组织文人进行《河仙十咏》的唱酬活动,正是受到明清诗人结社的影响,承袭中国《潇湘八景》、《西湖十景》等中华文风,将之在南圻传播,且在珠江流域与湄公河流域之间形成互动。“白社”诗人与“招英阁”诗人隔海唱和,这在18世纪上半叶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奇观。华人到异国他乡谋生或商旅往来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但像这样应邀到海外诗社聚众谈史论诗且形成隔海对歌的情形则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即使到了今天,也是难得的。中国诗歌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河仙十咏》以诗歌酬唱的方式在南圻与华南文人之间形成的文化互动,表明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依恋,亦是向祖籍国宣扬其在海外的文化成果。越南当代学者对郑天赐的文章事业有这样的评价:“到了郑天赐的时代,该地已成为人烟稠密之地,汉文化已经播及这里”,也认为其《河仙十咏》“题材模仿中国的《苍梧八景》或《潇湘八景》”^③。

① 参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记述其诗酒相聚的盛况。

② 石崇:《金谷诗序》,载严可均辑《全晋文》卷33。

③ 文新:《越南文学史稿》第3册,(河内)文史地出版社,1959,第249~250页。

其实，追溯起来，郑天赐之所以组织闽粤文人进行诗文创作，与其本身为粤人后裔息息相关。在上文所录郑天赐自序中提到的“先君”即其父郑玖。郑玖于17世纪下半叶从雷州半岛渡海到河仙。河仙位于今越南最南端，西边与柬埔寨接壤，南边是泰国湾。实际上，这个地方从前是真腊（今柬埔寨）故地，18世纪以后才纳入越南版图。明清换代之际，郑玖、杨彦迪、陈上川等明朝遗民义不事清，率众避居南圻，引起规模庞大的移民浪潮。他们来到南圻以后，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对南圻的开发和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今天越南南方繁荣的基础。郑氏从事对河仙地区的开发经营，仅仅三十余年，就将河仙这个蛮荒之地建设成“南天乐园”。郑天赐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大力振兴文教和招聘中越文教之士，使河仙文风始于海隅。现在当地还有华人会馆和民间为之供奉的牌匾，另有后人所题联句，表彰郑氏开拓功勋与河仙文风。^①

19世纪以后，来自广东的华侨华裔在越南的文学活动更是遍及越南南北，这在一些旅居越南的中国文人的见闻录以及越南典籍中都可见相关记载。例如，澎湖进士蔡廷兰在其《海南杂著》中就记录了他与越南当地华侨诗文来往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广东裔。书中有这样的文字：

二十三日，见总督官阮公……有教授官陈海亭、秀才胡宝定（祖籍俱广东顺德县）来联吟。胡君诗致清矫，才尤敏。日暮继烛，鸡鸣始罢。^②

初九日，有儒士陈如琛、陈辉光、黄壁光（俱广东广州人，能诗）来访，言东京地大物饶，城池巩固，市井繁华，珍宝之甲越南，又多衣冠胜迹，不可不一寓目。邀入城，观黎氏故宫，画栋雕梁，重楼复阁，历历烟草中。过廛肆，刀币云屯，目所未睹。渡珥河江（古富良江），阅天使馆（在珥河左侧），丰碑巍峨，气象伊伊。又至同仁社，观二女庙、返宿如琛园中，与怀凭吊，吟答终宵，觉观览之余，别深寄托。^③

① 关于郑氏在河仙的事迹过去一直鲜为人知，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做过深度研究，相关成果不断出现，最新出版的成果可参见李庆新《郑玖、郑天赐与河仙政权（港口国）》，《海洋史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71~216页。

② 蔡廷兰：《海南杂著》，陈益源校点，收入陈益源《蔡廷兰及其海南杂著》，（台北）里仁书局，2006，第149页。

③ 陈益源：《蔡廷兰及其海南杂著》，第149页。

蔡氏于道光十五年（1835）秋赴福州省城乡试，回澎湖途中遭台风，漂泊到越南中部广义省思义府，当地越南人得知他为清国“翁廩生”后对之礼遇有加，并拟择舟送回，但蔡氏受到惊恐，宁愿徒步返回。在越南人的护送下，他经越南广南、广平、义安、宁瓶、谅山一线到达中国镇南关、南宁而后经广东于道光十六年（1836）回到福建，之后不久有《海南杂著》传世。其内容包括《沧溟纪险》、《炎荒纪程》、《越南纪略》三篇，书中除了记录他本人的历险过程，还对越南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有不少生动的描述，这也是台湾人第一部有关外国历史及民族文化的杰作，已先后被翻译成俄、法、日及现代越南文等外文。如今，它也成为中越两国文人交往的重要例证。

二 书籍传播所形成的文学交流

明清时期，中越书籍贸易兴盛。《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记述了天顺元年（1457）六月，即越南后黎朝仁宗延宁四年，安南朝贡使黎文老的一席话，谈到书籍和药材自古以来便是安南从中国输入的两大宗货物，其原话为：

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

18世纪越南西山朝出于发展本国喃文文学的目的，曾经下令禁止从中国进口书籍^①，但这恰好从侧面说明当时的书籍贸易十分普遍。虽然由于战乱频仍以及天气炎热等人为或天然因素，越南所藏中国善本书籍极少，但在一些文人的诗文中则可见越南人竞相购买中国书籍的情形。黎贵惇在其《北使通录》卷四中抄录了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越南赴清贡使团返经桂林时被中国官府没收的一批沿途采购来的中国书籍名单，其中有《智囊》、《千古奇闻》、《封神演义》、《说铃》、《锦香亭》、《山海经》、《贪欢报》、《列仙传》等。同样出使过中国的郑怀德在其《艮斋诗集》中写到因为“向慕唐诗风调”，“爱购三唐名集，诸家法语……研究其气格体裁，关巧底蕴

^① 陈重金：《越南史略》，中华书局，1998，第324页。

之所在。寝食其间，绎意翻题，效颦学步，久后惯熟，触景生情，放笔肆吟，终不违乎”^①。

上文提到的1830年代与李文馥一起到广东公干且参加“中外群英会”诗歌唱和的汝伯士和黄炯都曾经在广东搜求书籍。例如汝伯士在其《粤行杂草编辑》中有一首《夏日旅怀呈李邻芝文馥》中有“诗少成吟因有病，书多欲购奈无金”。而《粤行杂草编辑》卷下《书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他在广东拣买书籍的情形：

余在广东购买官书，每访书庸，见环城者二十余，皆堆积书籍，重架叠级不知数，问其名目，则彼此各以本庸书目示，皆至一二千余名。问经数月拣购，惟筠清行为多，余于还价日得书目一本，今并录之。^②

在这个书目中列举了“筠清行”书店中有关《皇朝文典》、《春秋繁露》、《全唐诗话》、《绣像三国志》、《三国全文》、《大明一统志》等共1762种书名。^③

还有，19世纪越南著名词人从善王阮绵审（1819~1870）不但自己在出使中国期间买书，还常托人通过广东来的商船直接购买中国书籍，或者通过前往北京的使臣购书。他写过一首《购书》，咏唱他从中国购书的酸甜苦辣：

世俗学干禄，坊书乏佳者。
粤东估船至，杂物积巨舸。
节要与辰文，束之高阁可。
列单寄某某，错买谁能那。
四载一使燕，待此计良左。
矧乃不肯受，相向愁尾琐。
抬夫有常定，伊谁克负荷。

① 郑怀德：《良斋诗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第127页。

② 转引自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之《清代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购书经验》，中华书局，2011，第5~6页。

③ 参见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之《清代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购书经验》的附录《筠清行书目》，第17~48页。

佣雇费敢惜，雨潦测诚叵。
 所以购之难，十愿九不果。
 安得此陈农，亲求遍天下。^①

尽管购书大不易，但出于对中国书籍的热爱，出身王室的他竟愿意像农夫一样遍访各地，以求佳书。由于中国印刷术先进，费用相对低廉，不少越南书籍在中国刊行后送往越南。在19世纪后40年，甚至有些喃文作品是在广东特别是佛山地区印制的。许多书的扉页上，还注有中国出版者的姓名和出版地点，同时也印有西贡发行者的名字。

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越南人所购买的书籍有多少是在广东地区买进或通过广东商人运送的。不过，书籍流通所带来的粤越文学交流则有文本足证，而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广东木鱼书《花笺记》与越南喃传《花笺传》的关系了。

《花笺记》，全称《第八才子花笺记》，是明末清初广东著名的木鱼歌创作作品。内容叙述书生宰相之子梁芳洲与武将杨某之女杨瑶仙一见倾心，通过瑶仙的两个侍女的周旋，私订了终身。但在此同时，梁公却为儿子聘订了一位三从四德的大家闺秀刘玉卿。不愿违抗父命，便勉强同意。后来芳洲应试，中了探花，在京城又与瑶仙相见，当得知杨公被围的消息之后，便奋身自任，乞为杨公解围，得到皇帝的允许，便率师出征去了。但传到刘玉卿耳中的消息，却是梁芳洲在这次解围中阵亡，刘立刻投江自杀，幸而为督学龙某所救，并认为义女。最后是大团圆结局，梁芳洲胜利回朝，奉旨娶了杨刘二女。此书故事情节虽然落入才子佳人的小说俗套，但它对少年男女恋爱时反复相思、牵肠挂肚的心理描写极为深刻、细腻，文笔也清秀可喜。这部作品在1824年被译成英文，之后又被译为俄文(1826)、德文(1836)、荷兰文(1866)、丹麦文(1871)、法文(1876)。德国著名大诗人歌德读了《花笺记》更是深受感动，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激情满怀地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②

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8世纪《花笺记》就传播到越南，阮辉嗣根据《花笺记》用喃文六八体诗歌形式改编而成的《花笺传》成为越南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越南的喃传中有不少是根据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改编而来的，但

① 阮绵审：《仓山诗集》，日本东洋文库藏，嗣德十年刊本。

② 梁培焯点校《花笺记会校会评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5页。

阮辉嗣《花笺传》对越南喃传的繁荣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首先体现在它是越南北方第一部士大夫文人写就的六八体喃传，其次它是第一部成功地借用中国才子佳人题材演绎越南社会生活，把中国文学的内容与艺术技巧吸收到越南文学创作中的作品，其风格形式甚至直接影响了其后大文豪阮攸取材于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的文学名著《翘传》（亦是喃传）。越南阮朝才子高伯适在绍治癸卯年（1843）七月作《第八才子花笺演音后序》，对此书有高度评价：

生是邦也，国语之语可废乎？不可也。读国语也，《花笺》、《金云翘》之书可废乎？不可也。噫，古人匠心妙旨，所以羽翼吾之文章也，而可以浅窥也哉！夫古人郑苦于情，而郑难于过。合而伸之，天下之理想过半矣。吾于《花笺》之旨良有感焉。其为说也，起于配匹之际，情爱神昵之私，而达于父子之伦，主臣之义，朋友切愧之雅，兄弟相好之情，大而朝政兵谋，褒忠劝节之典，小而人情世态，风气草木之微，其文奇其义正。说理则辩而不窒，语势诡而有经，至于叙散悲欢，位置境遇，断续引线，光怪陆离，辞发悲壮之音，文极顿挫之致，此其尘垢糠粃犹将陶铸百瓦衣被作者，而使《金云翘》瞠乎其后。近世轻薄之徒，资为话柄，操孤家往往不察，委为淫辞艳曲，可悲也夫！予废久偶于邻翁废麓检得是本，取而阅之，愁闷中，如获至宝。……嗟夫！以国语为文章，吾未敢也，苟以文章观国语，则吾窃有取焉。我国韩途以后，作家林立，温如述古规模少陵，鹏郡宫词驰骋汉魏，至于传曲之工，吾后得花笺、金云翘焉。夫以国语观国语，二书不可坐矣，必进而求通乎吾文章之事，与我同好，其谓《金云翘》达世语，《花笺》则警世语也。^①

这里高伯适将《花笺传》列为“警世语”，大概是认为《花笺传》里的人物，在行为方面足以为后世所效仿，是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的典范。

《花笺传》作者阮辉嗣，字有之，号蕴斋，生于1743年。据《凤阳世谱》及《阮氏家谱》记载，阮辉嗣出生于河净省罗山县县长流里的簪瓔世家，

^① 参见阮辉嗣、阮善《花笺传》之前言部分，陶维英译注，（河内）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

其父阮辉莹，官至尚书。他自幼受到诗书的熏陶，在乡中颇有文名。17岁乡试第三名，即被召到郑主宫中充任随讲，25岁出任国威府（今山西）知府，31岁改任武职，官兴化镇守。阮辉嗣先后娶吏部尚书阮侃（阮攸之兄）的两个女儿为妻。而阮攸所属的仙田阮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越南歌谣“鸿山兰水有时尽，阮氏科名永不穷”，就是这一家族的真实写照。这一家族有不少人雄踞文坛，其中，阮俨、阮侃、阮善等都有汉喃作品行世，形成了闻名遐迩的“鸿山文派”。这样的家族肯将两个女儿嫁给阮辉嗣，足以证明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花笺传》写成之后，曾经阮善（辉嗣的内兄，阮攸之侄）润饰且很快在文坛推广。

阮辉嗣的著作很多，流传至今的却只有《花笺传》一篇。这部作品最初是一部长达一千五百多行的六八体长诗。阮善将之修改润色到一千七百多行。后来又不断有人润色，诗句也越来越长。例如明命间武大问增饰润色的版本长达一千八百余行。此外，据20世纪70年代赴台湾地区求学的越南人陈光辉博士的调查，在越南坊间还有一千八百三十行的《花笺传》本流行。^①

由于越南喃文书籍不流通，甚至极难获取，笔者无从查找当年阮辉嗣的喃文原本及各种润色本。但笔者曾在越南国家图书馆复印了1978年陶维英翻译并注释的《花笺传》，该书收录了阮善的润色本（1766行）和阮辉嗣原本（1532行）。据陶维英在序言中称，阮辉嗣原本是阮氏家族的后人赠送给他的。^②

我们考察阮辉嗣原本《花笺传》与《花笺记》，发现两者在故事、人物、内容、情节和结构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阮辉嗣没有分卷，但保留了原作中的59个回目且都用四字汉语借词表达。尽管如此，《花笺传》并非《花笺记》简单的翻译，而是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艺术处理的具有越南民族特色的作品，而且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似乎更为完美。下面我们仅以第一回“花笺大意”为例对比研究。^③

① 陈光辉：《越南喃传与中国小说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学中国研究所博士论文，1973，第47页。

② 阮辉嗣、阮善：《花笺传》之陶维英序。

③ 中越文本参考如下：梁培炽点校《花笺记会校会评本》，第5页；陶维英所翻译且注释的阮辉嗣、阮善《花笺传》。由于《花笺传》尚无中译本，此处所引阮辉嗣《花笺传》“花笺大意”由笔者暂译。

花笺记(无名氏)	花笺传(〔越〕阮辉嗣)
<p>起凭危栏纳晚凉， 秋风吹送白莲香。 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 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 细想天上佳期还有会， 人生何苦捱凄凉。 得快乐时须快乐， 何妨窃玉共偷香？ 但能两下全终始， 私情密约也何妨。 自古有情定遂心头愿， 只要坚心宁耐等成双。 山水无情能聚会， 多情无信肯相忘。 但愿世间情重者， 勿要半途而废就抛荒。 曾闻一段奇风月， 钟情好似海天长。 埋没风流谁晓得？ 故此替他传出与后人看。 苏州府内吴江县， 有一人才身姓梁。 父号印波为学士， 母亲姚氏极贤良。 雁行孤独无兄弟， 名讳芳州字亦沧。 貌比春红添月色， 才如鲜锦灿云光。 风流好似骑鲸客， 雅致犹如跨凤郎。 年登十八叨儒列， 只待飞腾上帝邦。</p>	<p>1. Nư·o·ng lo·n nhẹ bóng mái chiều 凭栏晚风轻轻吹 Vàng pha gió trắng que diu hươ·ng sen 金桂白莲共飘香 Gác rèm câu nguyệt xiên xiên 竹帘里新月斜照 Này hôm à Chú·c chàng Khiên hợp vậy, 今夜七夕正相会 5. Hẹn lành năm một đêm nay 一年才有此良约 Trên kia còn vậy dưới này khiến sao! 天上尚且如此，地下又能怎样 Từng nghe trăng gió duyên nào 曾闻一段风月事 Bề sâu là nghĩa non cao là tình 山高水长情义深 10. Nói vay mượn tiếng chấp chành để gu·o·ng 说来足以为榜样 Rằng Tô·châu, giải Ngô·giang, 话说苏州吴江县 Trâm thân có đúng họ Lu·o·ng truyền nhà 一梁姓簪缨世家 Tu·o·ng·cô·ng chữ gọi Ấn·Ba, 其字印波，为卿相 Sang yêu sớm đã dự toà Bình·chu·o·ng. 年轻有为居平章 15. Gió thanh hây·hây gác vầng, 黄阁中清风徐来 Thành·thời chèo Phó, nhẹ·nhàng gánh Y. 如傅悦伊尹名相 Giúp trong Diêu thị khôn nghi 家有贤妻谓姚氏 Điền nhà sớm ú·ng lân nhi một chàng 早早喜获一麟儿 Húy Phu·o·ng·Châu, tự Diệc·Thu·o·ng, 名讳芳州字亦沧 20. Phong·nghi khác giá, từ·chu·o·ng tốt loài. 风姿异常擅文章 Cám hoa tài·mạo gồm hai, 富贵又兼才貌强 Đua tay nhày phu·o·ng chen vai cỡi kình. 跨风骑鲸风流长 Gia·quan mới dạo cung huỳnh, 加冠即将入太学 Thú nhà hầu·hạ huyền·đình bấy lâu. 萱草承欢能几时</p>

通过这段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人物姓名、地点及故事情节基本不变，但阮辉嗣作了适当的处理。中文原文为 32 行诗，阮辉嗣改写成了 24 行，其中有 12 行（表中黑体字部分）是完全舍弃了的。尤其是“得快乐时须快乐，何妨窃玉共偷香？但能两下全终始，私情密约也何妨”这种显得粗俗而又不合乎礼教的词句，阮辉嗣完全舍弃了。保留的部分，阮辉嗣也改

写得比原作更雅致，特别是多处用典，把梁氏父子的形象更加美化了。例如原文说到梁父，只用了两行“一人才身姓梁，父号印波为学士”，阮辉嗣把它扩写成5行，将原文只模糊交代身份的梁父改写为出生簪缨世家且位居宰相，不仅如此，还用了房玄龄、傅悦、伊尹等历史上的名相相比，其中“黄阁清风”一句正是化用了唐代诗人皮日休赞房玄龄的诗“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同样，对梁芳洲的描述虽然风姿才貌基本不变，但最后一句“只待飞腾上帝邦”则改成了“萱草承欢能几时”，化用《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既寄托了对母亲的深情，又暗含他很快要别母登程，以此说明他是一个孝顺且有情义的人，比原诗“只待飞腾上帝邦”中那种急切达到个人目标的语言显然要高明。如果我们进一步参看阮善润色的本子，发现“花笺大意”仅用了22行，文字比阮辉嗣原本更简洁明快，尤其是开头几句甚至改编了原意。阮辉嗣原文承袭了《花笺记》以中国传统的七夕节，织女牛郎相会的月夜景致去赋比出人间的悲欢离合，从而展开故事的情节；而阮善则改写为“人生百年红绳牵，才色二字在其间”，从谈论佳人才子的爱恋去揭示全书的旨意。后来阮攸《金云翘传》以“人生不满百，才命两相妨”开篇，与此表达方式相似，这也可见《花笺传》的影响。

而在紧接着“拜母登程”这一回中，原文有48行，而阮辉嗣大刀阔斧地剪裁，只写了20行。尤其是对前面的“芸窗自古多寥寂，潜来花下笑寻芳。好鸟枝头迎客叫，百花丛内喷人香。桃花片片随流水，牵惹游人欲断肠。花因春尽多零落，人貌何曾得久长？若不风流虚一世，算来难及水鸳鸯。相挨相倚池边绕，相爱相连几在行。自想韶华虚十八，谁能一世守孤窗。点能得个崔莺女，等我安排手段学《西厢》。闻得长洲多美女，嫩红娇白斗新妆。意欲馆迁城上住，风流或者遂心肠”这种露骨的寻芳心里，阮辉嗣或舍弃，或改写成纯粹的写景。正是这些删减和美化处理，使得越南的《花笺传》有了它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不同于先前的广东木鱼书底本了。

《花笺记》还间接影响了越南南方一部喃传——《陆（蓼）云仙传》的创作。《陆（蓼）云仙传》被誉为“越南南方的《金云翘传》”。黄轶球先生曾经对比《陆（蓼）云仙传》与广东木鱼书《花笺记》的入话与煞尾，说明二者在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上的相似性。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可以见出许多越南名著，从故事情节到思想，从内容到形式，

都与木鱼书有承传性质，至为明显。再结合历史上广东旅越华侨人数之多，嗜读木鱼书习惯的普遍，越南无名氏作品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会是无源之水。^①

我们可以想见，广东文学对于越南的影响肯定不止《花笺记》一篇。上文提到的越南文士李文馥，去广东公干回国后曾写了《二十四孝演歌》，此作品正是受广东木鱼书《二十四孝歌》的启发写成。在越南还有一部流传广泛的喃传《二度梅传》，相传是李文馥所撰。李文馥在广东期间与广东文人交往甚多，其中有一些是说唱文学的创作者，如上文提到的缪艮就是一位在清代中期以创作龙舟《客途秋恨》闻名的文人，而他曾经为李文馥的书籍作序。李文馥受到木鱼书和龙舟的影响并从事相关创作应在情理之中。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越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广东与越南地区的文学无论是人员流动所带来的直接交流和沟通，还是书籍传播所带来的文学深层影响，都让人感受到：在17~19世纪，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地区在文学上的交汇就像北部湾的海水一样在循环流动。同时，也令人感到北部湾周边地区的文学同处于文学生态的一个食物链上，它们都面临着对来自北方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吸收与改造。^②而越南对于来自北方的中国文学的接受，在某些方面还经过了广东文学的过滤。传入越南后的中国文学作品，有的保留着原汁原味，但有相当多的经过了越化处理，其地位和影响骤升，大大超过原作在本国的影响。

在广东文学与越南文学的交流中，特别令人好奇的便是木鱼书与喃传的关系，其中尚存在许多秘密有待破解。从文学的起源来看，喃传与木鱼书都产生于民间的岁时节日、迎神赛会、休闲娱乐等民俗活动，且有着共同的娱乐劝惩及道德教化的功能。从文学体裁来看，它们都属于韵文小说的范畴。不同的是木鱼书的体裁多为七言诗歌形式，喃传则在16世纪前后经历了由

① 黄铁球：《越南古典文学名著成书渊源》，徐亮等编注《黄铁球著译选集》，第51页。原载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② 如对于《二度梅》小说的改编，广东木鱼书有《二度梅全传》；越南喃传则有《二度梅传》、《二度梅精选》等多种。

七言诗歌向六八体和双七六八体诗歌的转变。这一时间恰好是木鱼书产生的时期。广东木鱼书和越南喃传分别代表了各自的民族文学特色，尤其是以《翘传》为代表的越南喃传，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史中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是越南民族文学成熟的特征之一。但这两种文学样式之间到底有无共生共长的文化背景，它们在各自发展的轨道中又是如何交汇的，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探索。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anton Area and Vietnam in the 17 -19th Century

Xia Lu

For the long and close relationship of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cademic circl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exchanges of the top drawer, especially attributed it to the Vietnam long-term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about poetry. Rare researches, however, have studied the folk literature exchanges and influences by the Southern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at the time. Guangdong Province, located across the sea from Vietnam, has been in close and special contact with Vietnam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arge quantities of Cantonese, refused to obey the rules of Qing Dynasty, arriv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of today's Vietnam to make a living. Later, with the sea trade development, the personnel flow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Vietnam and Canton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so did literary exchanges, especially marked by *Hà Tiên thập vịnh* (河仙十咏), a rare poetry collection edited by a leading Vietnam writer, *Mạc Thiên Tú* (鄭天賜) Cantonese descent in the mid-18 century. The poems in the collection were written by both Vietnam poets from *Chiêu Anh Các* (招英閣) Poetry Society of *Hà Tiên* (河仙) and the *Bai She* (白社) Poetry Society of Guang Dong area. At almost the same time, *Hoa tiên kí* (《花箋记》), a masterpiece in Canton *Muyu Book* (木鱼书) spread to Vietnam and was then

adapted by *Nguyễn Huy Tụ* (阮辉嗣) a literary giant in North Vietnam, into a long poem *Truyện Hoa Tiên* (《花笺传》) in *Lục Bát* (六八) form Vietnam, which later became one of the Vietnamese epoch-making classical works.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scholars and poets and the influence brought by the spread of books. This paper also aims to reveal this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ton literature and Vietnamese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17 – 19th Century; Canton; Vietnamese; Literature Exchange

(责任编辑: 徐素琴)